

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

张文娟

【内容摘要】利用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调查”数据,综合其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流出地及迁移过程的相关信息,对迁移所带来的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流动人口的迁移方式以及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相关社会、经济背景均会对他们的养老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迁移在提高流动人口经济赡养能力与维系其对父母的传统养老责任方面存在冲突—在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获得改善的同时,他们与流入地社会的融合削弱了其原有的养老意愿。研究还指出,就外出者在流出地所处的大家庭而言,他们与父母之间仍旧延续了传统的代际互惠和交换模式,成年子女之间保留了资源分配优化的群体合作分工方式,外出成为调节子女之间养老分工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家庭养老;代际支持;经济支持

【作者简介】张文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100872

Effects of Adult Children's Migration on Their Financial Support to Old Parents

Zhang Wenjuan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of rural – urban migrants in China conducted b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2009,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out – migrants to their old parents in rural China. Social economic status of migrants as well as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process are introduced into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migration patterns and socio –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ir behaviors of aging support. Out – migration has conflicting effects on improving the economic status of out – migrants and taking their traditional obligation of family support. Importantly the tradi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patterns of reciprocity and exchange are maintained in families of migrants' parents. The corporate group model is still the regulation for division of aging support among adult children whose migration behaviors bec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n adjusting the division of family support.

Keywords: Family Suppor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inancial Support

Author: Zhang Wenju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Email: zhwenj@263.net

^{*} 本研究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07JZD0027)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老年人长期照料需求评估及对策分析(09YJC840051)支持。

1 问题提出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仍然是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构成了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主要内容,而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经济帮助仍然是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最重要的养老需求。劳动收入和家庭成员供养是中国农村老年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女性老年人对家庭供养的依赖更加严重(杜鹏,2003)。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极大的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对生活在其中的老年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年子女的外出究竟会对他们的经济供养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对此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指出,由于外出子女的经济供养水平普遍非常低,留守老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甚至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叶敬忠、贺聪志,2009);对外蒙古、泰国以及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人口迁移现象研究结果显示,子女外出导致老年人的贫困化问题更为严重(Skeldon,1999)。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外出的子女往往会通过对老人的经济补偿来弥补照料等方面的缺位(杜鹏等,2004;张文娟、李树茁,2004;孙鹁娟,2006);而对墨西哥和泰国的研究证明:子女在迁入地就业后收入水平相对提高,能增加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大多数老人的物质条件在子女外出后都有所改善(Knodel & Saengtiencha,2007)。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外出对子女的经济供养行为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

已有研究显示,留守老人在经济上能否受益于子女的外出,与各地区的社会政策、经济状况、劳动力迁移特征和地方文化等有直接关系。为了进一步揭示成年子女的外出过程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本文将结合其在流入地及流出地的相关信息,对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的意愿,以及经济支持水平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不同的乡-城人口流动模式对农村外出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

2 理论背景

研究显示,乡城之间的迁移和流动改变了外出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他们的传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同时也使代际间的空间距离发生变化,进而对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及子女之间的养老分工产生深远影响。为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农村家庭中成年子女的外出行为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研究者将从代际交换、迁移动机以及社会融合的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和推导,审视人口流动可能引发的子女经济支持行为的变化。

2.1 代际支持理论——交换模型和群体合作模型

西方学者提出了三种模型,即权力与协商模型、交换模型和群体合作模型来描述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行为动机。其中的群体合作和交换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对现代家庭中的代际交换行为动机的解释。在交换模型中,代际间的交换按照“投桃报李”的原则进行,交换者以个人福利最大化为目标(Cox,1987)。在群体合作模式下,家庭成员的行为以群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由一位公正的家庭成员控制并有效分配家庭资源,保证每一位家庭成员的生存(Becker,1993),年轻家庭成员会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支持,以保持家庭的整体性和成员行为的利他性。对于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研究发现,上述两种模式可能同时在支配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换行为(Sun,2002;Silverstein,2002)。在很多情况下,交换模型和群体合作模型两者之间难以分辨。值得庆幸的是,子女的经济状况与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供养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两个模型中表现出相同的变动方向,既:成年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越好,其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子女的经济状况与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之间的上述变动规律为本文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了逻辑推导的依据,如果外出务工确实改善了成年子女的经济状况,那么在以交换或群体合作模型为特征的代际交换模式下,他们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也将有显著提升。

2.2 推-拉理论——个人特征对子女经济支持能力的影响

雷文斯坦(E. G. Ravenstein)曾经指出,迁移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经济因素,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是迁移的最主要动机;而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以改善生活条件为目的迁移者在迁移人群中占绝大多数(段成荣等 2008)。推-拉理论指出,影响迁移的因素有四种:迁出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的障碍因素、个人因素,来自迁出地和迁入地的诸多因素中均表现出推力和拉力两种效用(Lee, 1966)。有学者进一步证明,迁入、迁出以及中间的障碍因素对于不同特征人群所产生的推力和拉力存在很大差异(段成荣 2000;程名望等 2005)。因此,对于不同特征的流动人口而言,尽管迁移行为会带来经济状况的改善,但是程度不尽相同,他们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的变化也存在差异。进而,在群体合作/交换模式支配下的代际关系中,这些外出者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也会表现出显著差别。

2.3 迁移的成本效益分析——外出距离对子女经济供养能力的影响

对人们迁移行为的研究表明,迁移者对迁移过程中的成本和利益的考虑是决定其是否迁移的根本原因。迁移成本不仅包括与迁移有关的直接成本,而且包括他们流动和寻找工作所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以及在特定地点的资产的放弃(Da Vanzo, 1981)。迁移距离与迁移成本成正比关系,与迁移概率成反比关系。距离不仅意味着旅费、路途时间和相关的心理成本,更重要的是为寻找必要的机会所需要的一定的社会网络(Yap, 1977; Mamermesh & Rees, 1993)。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空间距离越大,流入地表现出的推力越大,迁移者需要克服的中间制度障碍越多。以空间距离为代理变量的流动成本对地区间的人口迁移率有非常强的负面影响,其程度甚至远高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省际间的大范围流动,不仅意味着需要支付较多的交通费用,也意味着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需要付出较多的物质、精神费用(严善平 2007);因此,离乡型迁移需要支付高的成本,该类型的迁移人群的收入也大都高于不离乡型迁移的收入(吴兴陆等 2003)。然而,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流动链为迁移人口提供了就业和生活方面的信息,大大降低了流动所产生的成本和费用,减少了流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克服了距离对流动的不利影响。其结果是,从一个地区迁居另一个地区的人口存量越大,此后便有更多的人口在同方向加速流动(严善平 2007)。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推断,远距离流动能够使流动者的经济状况获得更大的改善,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能力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但是,对于借助流动链条整群外出的流动人口而言,外出务工的空间距离与经济供养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确定。

2.4 流入环境对子女经济供养行为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迁移会导致人们的传统养老观念淡化,降低老年人和社区对子女的控制能力,从而削弱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体系(Chan, 1999; Hermalin, 2002)。此外,城市多元文化的影响弱化了家庭对老年人的支持保障功能(张友琴 2002);而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Du & Tu, 2000)。同时,他们的非亲缘的社会网络关系得到扩展,异质性增强(罗忆源, 2003),淡化了原有的乡村人情社会对于人们遵循传统文化的约束力。由此可见,无论是主观还是被动,外出子女的传统养老意愿都可能在其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被不断削弱。然而,流动人口在现代城市的社会融入过程是一个包含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的复杂过程,流动人口在这一融入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大差别(杨菊华 2009)。因此,他们的养老观念和行为的转变也存在很大差异。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人口流动链促进了流动人口的聚集,使得来自同一流出地的人口在某一特定流入地聚集。长期累积形成的结果是,在流入地形成了以由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这个群体通常在流入地也倾向于聚居,他们的社会网络、生活习惯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外出前的状态。在北京城市外围产生的浙江村、河南村等既是这种形态的典型代表。对于生存在其中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不过是将村落由家乡搬到了京城。在这种氛围下,现代城市文化对于流入人口的影

响较小,他们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养老意愿得到很大程度上的保留,乡村人情社会的习俗和舆论仍对其行为存在很大的约束作用。

上述理论分析和推导说明,人口的迁移流动过程,以及迁移者在流入地的生活状态对他们的养老意愿和供养能力存在深刻的影响。在意愿和能力的共同作用下,流动人口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支持行为。

3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 2009 年进行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调查”。该调查选取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长江三角洲的浙江省和京津地区的北京市作为流入地调查点;在此基础上,将流入地中流入人口相对集中的来源地作为对比调查的流出地,并相应选取了中部的河南和湖南、西部的贵州等人口输出的重点地区作为流出地。由此确定三组流入地-流出地对比追踪调查地点,既广东东莞-湖南嘉禾,浙江诸暨-贵州遵义,北京-河南滑县。调查对象由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部分受访者组成。在流入地的调查对象包括:来自选定的流出地的流动人口,以及在该流入地但是来自其它流出地的流动人口。流出地的调查对象包括:留守配偶、年龄在 55 岁及以上的老年或准老年父母、未外出的中青年人群。本文在分析外出子女的迁移特征对他们的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时,采用在流入地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在探讨老年人家庭中各个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供养行为时,分析数据来自在流出地对父母的调查。

在广东东莞、浙江诸暨和北京三个流入地中,以来自贵州遵义的流动人口在浙江诸暨的聚集居住程度最高,他们在流入地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区网络;来自湖南嘉禾的流动人口在调查地广东东莞也形成了流动链,但是他们在流入地的居住较为分散,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较高;来自河南滑县的流动人口在北京市的居住虽然也较为分散,但是他们多生活在由同质的流动人口组成的相对封闭环境中。上述三组点对点的人口流动链条中,以贵州到浙江这一链条的集群式流动特征最为突出。三个流出地的经济条件略有差异,比较 2008 年三地的经济水平可以发现,嘉禾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4554 元,遵义县为 4259 元,河南滑县为 4627 元^①。因此,三个流出地中,以遵义县的经济状况最差,推动人口外出的经济力量最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不同的社会生存方式及其在流出地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差异将会对他们的养老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3.2 研究方法

本文对于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的分析分为两部分:首先,利用流入地调查数据对来自不同流出地、具有不同迁移特征的人群展开分析,并探讨不同聚集程度下的流动人口在经济供养行为方面存在的差异;然后,利用流出地的调查数据对老年人家庭中的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进行分析,比较不同迁移方式对子女养老行为产生的影响。

对第一部分流入地的流动人口分析,本文将采用 LOGISTIC 模型,以逐步回归的方式,分析迁移过程的相关特征对外出者是否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影响。模型以子女是否为父亲或母亲中的任何一位提供经济帮助为因变量;将流动是否为群体式流动、在流入地的居住地时间、是否居家迁入、在流入地的职业、月收入、以及是否计划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等变量作为自变量,同时控制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留守孩子数量等个人特征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利用流出地对父母的调查信息,探讨老年人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揭示外出对他们的经济供养行为和子女内部分工的影响。对于家庭内部各个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

^① 三个数字分别来自 2009 年《湖南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和《河南统计年鉴》。

持的分析采用了线性回归模型,因为考虑到来自同一家庭内部的子女在关于老年人的相关特征及其家庭内部子女数量等信息方面的一致性,研究采用了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模型以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经济帮助水平 N 的对数运算值 $\ln(N+1)$ 为因变量;以子女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是否外出、外出距离、由老年人照料的孩子数量、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劳务帮助等为自变量,同时控制子女的性别、年龄、婚姻状态、以及父母的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和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

4 结果与讨论

4.1 迁移对成年子女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基于流入地的分析

(1) 外出子女的相关迁移特征

表 1 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外出者中,有 21% 的人在过去的 1 年内曾经为父母提供过包括现金、食物、药品、衣物在内的经济帮助。对比提供帮助和未提供帮助的两组外出人群的特征可以发现,两组人群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与没有为父母提供过经济帮助的外出子女相比,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成年子女中年龄在 25 岁以上的年长者所占的比例较低,男性、高中以上学历者、有配偶者的比重较高,父母双方健在者和父母无需照料者的比重较低。综合上述特征,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年龄较长的人群,其父母年老体弱的可能性更高,对外界帮助的需求相应增加;传统的家庭养老分工促使男性在外出后仍然担负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上述多种因素促使具有相关特征的外出者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增加。

为父母提供帮助和未提供帮助的两组外出人群在他们的相关迁移特征方面也存在差异。在为父母提供过经济帮助的外出人群中,工作角色为长期工/合同工或个体经营者的外出者、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人群、有兄弟姐妹同在本地的人群所占比重均较高。上述特征表明,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外出人群的经济状况更加稳定,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生活保障;该群体中在本地有更为密切的血缘或地缘关系。此外,接受来自父母的劳务帮助或者照看留守未成年子女服务的外出者在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人群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其在未提供经济支持的外出子女中所占的比重。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外出子女表现出三大特征:经济状况较好、在流入地有更加密切的血缘或地缘关系网、更有可能获得父母为其提供的照料子女服务或劳务帮助等。而上述特征可能会对外出者的代际支持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表 1 外出子女是否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 Logistic 模型变量分布与回归分析模型

Table 1 Variables and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Financial Support of Out-migrants

变量	变量分布(%)		回归模型:发生比 Exp(B)		
	未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	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年龄组: <25 岁	0.450	0.269			
25 ~ 29	0.144	0.188	1.817*	1.553+	1.508+
30 ~ 34	0.137	0.151	1.607+	1.264	1.184
35 ~ 39	0.124	0.172	2.029*	1.319	1.302
>39	0.144	0.220	2.172**	1.639+	1.653+
性别: 女					
男	0.529	0.615	1.305*	1.181	1.151
受教育程度: 文盲/小学	0.251	0.238			
初中	0.581	0.580	1.335	1.247	1.182
高中及以上	0.168	0.182	1.665*	1.507+	1.422
婚姻状态: 有偶分居	0.158	0.221			

续

变量	变量分布(%)		回归模型: 发生比 Exp(B)		
	未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	提供经济支持的子女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没有配偶	0.436	0.286	0.762	0.713	0.718
有偶同居	0.405	0.493	0.978	0.862	0.837
父母存活: 双方健在	0.838	0.768			
仅父亲健在	0.072	0.055	0.712	0.902	0.889
仅母亲健在	0.089	0.177	1.665*	1.661*	1.694*
父母照料者: 互相照料	0.103	0.108			
无需照料	0.725	0.674	0.927	0.997	1.026
被访者或其配偶	0.024	0.004	0.941	0.988	1.056
其他人	0.148	0.179	0.904	0.945	1.009
工作角色: 长期工/合同工	0.409	0.503			
个体经营者	0.076	0.108		0.781	0.761
其他	0.515	0.389		0.631**	0.692*
在本地居住时间: 1-3 年	0.182	0.168			
<1 年	0.292	0.145		0.568**	0.563**
3~6 年	0.261	0.242		0.897	0.906
6~10 年	0.158	0.211		1.145*	1.225*
<=10 年	0.107	0.234		1.761*	2.194**
目前工作由谁介绍: 亲戚	0.192	0.178			
自己联系	0.344	0.468		1.191	1.205
同村老乡	0.172	0.174		1.039	1.033
其他人	0.292	0.181		0.720*	0.807+
在本地有无兄弟姐妹: 无					
有	0.330	0.411		1.266*	1.342*
是否打算在此长期居住: 未定	0.361	0.393			
是	0.186	0.213		0.912	0.901
否	0.454	0.394		0.730*	0.706*
土地由谁耕种: 配偶	0.072	0.094			
父母	0.268	0.302		1.136*	1.181*
其他人	0.660	0.603		0.986	1.077
由父母照料的子女数量	0.097	0.225		1.339+	1.417*
流出地: 湖南嘉禾	0.223	0.203			
贵州遵义	0.179	0.212			1.808*
河南滑县	0.206	0.192			1.624*
其他地区	0.392	0.393			1.700+
log10(本月纯收入)	2310 ¹	2286 ¹			1.085
-2LL			1377.366	1315.595	1306.09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1 指上个月纯收入的均值(元)。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调查”2009。

(2) 结果和讨论

表 1 中模型 1 的回归结果显示, 外出子女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其是否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帮助影响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加, 外出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显著上升;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更倾向于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 外出子女中男性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高于女性。

然而,在模型 2 中,随着子女的迁移特征相关变量的引入,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变量的显著性消失。子女在流入地的工作角色、居住时间以及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资源成为解释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所造成的显著差异的直接变量。

模型 2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流入地停留时间较长的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较高。其中,在现流入地停留时间在 10 年以上的子女为父母提供物质帮助的可能性最高,是停留时间为 1~3 年的子女的 1.145 倍;停留时间不足 1 年的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最低,仅为 1~3 年的子女的 0.568 倍。即使在模型 3 中进一步控制了外出子女的收入水平,上述关系仍旧具有显著性。与未决定去留的人群相比,明确表示不打算长期在流入地居住的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较低,这或者是由于其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更不满意,进而降低了其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与长期工和合同工相比,作为临时工或家庭雇佣工的外出人群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后者的生活环境和收入的稳定性较差,削弱了其为父母提供帮助的能力。在有工作的人群中,部分外出者的职位可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通常该部分人群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力和工作能力;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通过亲属或老乡介绍获得目前的工作,与通过本地朋友、职业介绍所、单位招聘等其它途径获得工作的人相比,亲属和老乡在前一类人群的社会网络中占据了更主要的位置;而与通过亲戚获得工作的人相比,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工作的人群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受城市文化的影响较深,进而可能会降低其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而前者的社会网络中保留了较强的乡村社会关系,从而对他们的代际支持行为表现出更多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同理,对于在本地有兄弟姐妹的人群而言,他们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影响外出者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的另一类因素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各种互助行为。模型 2 和 3 的回归结果显示,如果家中的土地是由其父母耕种,则子女对其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较高,是由配偶负责耕种的外出人群的 1.14 倍。随着父母照料的留守孩子数量的增多,外出子女对其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明显增高。上述事实说明,为了回馈父母在农业劳动以及照料子女方面所提供的劳动和服务帮助,子女会为其提供经济支持,这恰恰与代际交换模式中的互惠原则相契合。

此外,作为来自不同流出地的外出务工人员,他们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在所有外出子女中,来自湖南嘉禾的外出人群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最低,而来自贵州遵义的外出人群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最高。这可能与流出地的经济条件,以及他们在流入地的城市化程度有关。在湖南嘉禾、贵州遵义及河南滑县三个流出地中,以遵义县的经济状况最差,父母对外界经济帮助的需求较高,来自这一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在流入地多结群而居,社会网络的地缘性和血缘性较为浓厚,更好的保留了传统养老观念对他们的约束。而嘉禾县的经济状况较好,他们选择的流入地—东莞本身也是一个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移民城市,流动人口在当时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较深。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外出子女的经济状况、在流入地的生活环境以及他们与留守父母之间的代际互动行为都会对他们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产生显著影响。在流入地生活时间较短、生活不稳定等特征均会降低其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进而在客观上降低了他们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如果外出子女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中,由亲戚、老乡等因血缘和地缘所产生的关系占据了主导位置,表明这部分人群仍然置身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影响之下,在原有村落的传统观念和舆论的约束下,他们会更好地履行赡养父母的责任;而对于社会网络中异质性资源较多的人群而言,其受现代城市生活的影响较强,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和舆论监督不断弱化,导致其提供代际支持的可能性下降。此外,对于由父母提供劳务帮助和照看子女帮助的外出人员而言,他们仍会遵从代际交换和互惠的模式,履行赡养父母的责任。

表2 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的多层线性模型变量分布与回归结果

Table 2 Variables and Results of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Financial Support of Children

变量	变量分布	回归模型: 非标准回归系数				
	百分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老年人特征						
儿子数(0): 1 个儿子	0.257	-1.652**	-1.255*	-1.217*	-1.381*	-1.399*
2 个儿子	0.358	-1.483**	-1.024 ⁺	-0.981 ⁺	-1.158*	-0.625
3 + 个儿子	0.359	-1.637**	-1.089 ⁺	-1.057 ⁺	-1.284*	-0.556
女儿数(0): 1 个女儿	0.300	0.102	0.187	0.193	0.114	0.007
2 个女儿	0.704	0.052	0.039	0.068	0.008	0.343
3 + 个女儿	0.283	0.011	0.139	0.166	0.114	0.627
性别(0 = 女) 男	0.468	0.019	-0.064	-0.074	0.012	0.316
年龄	66.076 ¹	0.022	-0.003	-0.001	0.005	-0.000
婚姻状态(0 = 无配偶): 有配偶	0.733	0.745**	0.554*	0.522*	0.486 ⁺	-0.102
ADL(0 = 完好): 受损:	0.017	0.284	0.690	0.644	0.649	0.644
子女信息						
性别(0 = 女): 男	0.557	0.402***	0.384***	0.365***	0.023*	0.011
年龄	37.748 ¹	-0.001	-0.003	0.003	0.006	0.011
婚姻状态(0 = 未婚): 有配偶	0.908	0.221	0.124	0.228	0.271	0.572 ⁺
离婚/丧偶	0.014	-0.877	-1.004 ⁺	-0.972 ⁺	-0.567	-1.550*
是否分家(0 = 否): 是	0.807	-0.301	-0.307 ⁺	-0.231	-0.193	-0.085
外出子女接受调查(0 = 有): 无	0.653	-0.382 ⁺				
嘉禾* 有外出子女被调查	0.118		-0.460	0.247	0.453	0.504
遵义* 有外出子女被调查	0.125		-0.921**	-0.993**	-0.885**	-1.233**
遵义* 无外出子女被调查	0.226		-1.295***	-1.230***	-1.264***	-1.642***
滑县* 有外出子女被调查	0.112		-0.650 ⁺	-0.542	-0.501	-0.701
滑县* 无外出子女被调查	0.167		-1.319***	-1.214***	-1.155***	-1.406***
现居住地(0 = 本村): 本镇				0.504*	0.347 ⁺	0.641*
本县	0.089			0.815***	0.560*	0.975***
本市/省	0.094			1.073***	0.627**	0.456*
省外	0.471			1.177***	0.744***	0.827***
经济状况(0 = 很好): 一般	0.489				-0.751***	-1.065***
较差	0.316				-1.453***	-2.021***
很差	0.085				-2.622***	-3.382***
受教育程度(0 = 小学以下): 初中	0.493				0.236	0.315 ⁺
高中及以上	0.135				0.410 ⁺	0.254
职业(0 = 农业): 非技术工人	0.286				0.371 ⁺	0.031
技术工人	0.163				0.679**	0.406
服务人员	0.133				0.551*	-0.061
文员/管理者	0.050				0.760*	0.786*
其他	0.071				-0.126	-1.032***
父母照看的孙子女数(0-2)	0.312 ¹					0.406***
父母提供劳务帮助(0 = 否): 是	0.161					0.218 ⁺
- LL		5386.090	5614.366	5584.588	3760.405	6224.290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1: 该数值为变量均值。

数据来源: 同表 1

4.2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基于流出地的分析

(1) 子女在流出地的家庭和社会经济特征

表2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流出地接收调查的655名老年人共有2636位子女存活,平均子女数量为3.6位。其中,超过71%的老年人至少有两个儿子,有98%的老年人至少有两个女儿。在过去一年中,每位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帮助平均为471元。在所有的老年人样本中,有65.3%的老年人作为子女的追踪调查对象接受调查。其中来自嘉禾的跟踪老年人占11.8%,来自遵义的跟踪老年人占12.5%,来自河南滑县的跟踪老年人占11.2%。在接受调查的老年人中男性约为47%;平均年龄在66岁;超过73%的老年人配偶仍然健在;他们中只有约1.7%的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受损。从整体来看,接受调查的老年人群较为年轻,以中低龄老年人为主。

在由接受调查的老年人的所有存活子女构成的子女群体中,有55.7%为男性,平均年龄为37.7岁,超过90%的人已经结婚。80.7%的子女已经与老年父母分家。所有子女中,以居住在省外者所占的比例最高,为47%,其次为在本村居住者,占23.3%;子女中有48.9%的人家庭经济状况一般,有8.5%的人家庭经济状况很差。绝大部分的子女(62.8%)至少受过初中教育,其中有13.5%的人群受过高中、中专或者大专以上的教育。子女中仅有不足30%的人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在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等二、三产业从业的工人。子女中平均每人有0.3个未成年孩子接受老年父母的照料,有超过16%的人接受父母提供的农活帮助。

(2) 结果与讨论

在多元分层线形回归分析的初始阶段,本研究将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以及子女数量等基本信息放入模型1中(见表2)。回归结果显示,儿子是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主要人选,其提供的物质帮助显著多于女儿。家庭中儿子的数量、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对每一位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都存在显著影响:随着儿子数量的增加,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的数量逐渐下降。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老年人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既定的情况下,儿子的数量越多,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儿子身上的供养负担越少。即使在引入子女的其他相关特征变量以后,上述效应仍显著存在。

模型1引入了老年人“是否有外出子女在流入地接受过调查”这一变量,以此对两类家庭中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进行比较,但是差异并不显著。考虑到来自嘉禾、遵义和滑县的外出子女在流入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网络中的异质性,研究者在模型2中考察了“是否有外出子女在流入地接受过调查”变量与流出地点变量的交互效应。结果显示,对于有外出子女在流入地接受过调查的老年人家庭而言,子女为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水平要高于其他家庭,而且这一差异在贵州的遵义和河南的滑县地区表现显著。三个地区中,嘉禾县的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帮助水平最高,遵义县的水平最低,这一方面与本地区的生活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外出子女在当地的生活状况有关。对于由遵义县流出至浙江诸暨的外出子女而言,他们虽然较其他两组外出人员跨越更远的空间距离,但是由于他们在流入地中形成的紧密的血缘和地缘网络,迁移的成本较低,因此他们可以接受在流入地相对较低的收益水平;同时,因为该群体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削弱了其获得高经济收入的能力,上述现象均会导致这一部分外出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下降。

为了进一步考察子女外出跨越的空间距离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模型3中引入了子女的现居住地变量。结果显示,在同样离家外出的情况下,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越远,他们为父母提供的经济帮助越多。迁移的相关理论已经证明,子女迁移的成本与他们迁移的空间距离成正比,只有在流入地获得足够多的收益方能够补偿他们在迁移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因此,子女离家越远,意味着他们外出所获得的经济收入越高,可以为父母提供的经济帮助也越多。当然子女离家越远,意味着他们为父母提供家务帮助和情感交流的机会越少,由此他们可能会通过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进行补偿。模

型 3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与居住在本镇的子女相比,在省外的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经济帮助增加了 1.1 倍;模型 4 中引入了子女的经济状况以及职业作为控制量后,上述差异降低至 0.8 倍,空间距离所产生的影响有所下降,这一事实证明了子女间确实存在代际支持中的分工协作行为。此外,模型 5 的回归结果显示,老人为子女提供农活帮助以及照看孩子的服务可以诱使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这一结果也印证了代际间的互惠和交换理论:父母提供劳务帮助来换取子女的物质支持。

对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的上述分析揭示了两个事实:首先,迁移过程对外出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外出行为能够提高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帮助水平。子女在外出后所获得的经济收入水平是影响其对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数量的重要因素,远距离外出的子女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父母的物质回馈。其次,老年父母为子女提供的照看未成年孩子以及耕种农田等劳务帮助诱使成年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而外出距离较远的子女通过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来弥补他们对父母的日常照料和情感交流中的不足,上述事实证明了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仍旧遵循代际互惠和交换的分工合作模式。

5 结论

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人口的流动对流动者个体、家庭和所在的社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流动者所处的家庭和社区环境同样也会对流动人口的思想 and 行为产生作用。人口的流动将流入地和流出地这两个孤立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进而产生相互影响,推动了两种社会文化的相互融合和交流,而置身其中的流动人口则是推动两种社会文化和环境交流与碰撞的媒介,也首当其冲地体现了两种社会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对流动者的影响代表了传统乡村文化和现在城市文明两种力量的较量,究竟在哪一点达到新的平衡,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为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流动者自身的各种特征,以及流动过程经历的不同,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对流动者的影响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流动者与现代城市社会的融合程度深浅不一,从而导致他们的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的转变也表现出诸多的不同。

对流入地的流动人口的经济支持行为与流出地的老年人家庭中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的分析综合展示了流动人口的迁移过程以及他们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其养老行为的复杂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成年子女的迁移过程确实对他们的代际支持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迁移所带来的经济状况改善提高了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导致其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显著上升,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也明显增加。但是,子女外出后的生活环境差异导致了他们对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可能性存在显著差异。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形成的流动链条使得外出人员在某些特定的流入地不断积聚。这种群体式的外出降低了因为空间距离增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减少了外出成本,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通过这种群体方式外出的人员在流入地仍旧处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的包围中,他们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生活方式将得到很大程度的保留,原有村落的习俗和舆论仍存在很大的约束力,因此他们履行传统养老责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是,正是因为这部分群体外出人员局限于旧有的社会环境,无法充分的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无法通过新的社会资本获益,因此削弱了其改善生活状况的能力,从而也降低了他们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水平。因此,迁移行为在维持和提高外出者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意愿以及提高其经济供养的能力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在流动人口群体中,城市文明与乡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其背后所隐藏的在流出地生存能力的提升与对传统农村养老方式的认同之间似乎也延续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由此可见,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对流入者的交互作用下,流动所引发的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行为的变化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方向。

将外出子女置于流出地父母所在的大家庭中后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对于整个老年人家庭而言,老

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方式仍遵循传统的代际交换和互惠的模式。经济状况较好的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高,提供经济支持的数量也越多;如果父母为其照料未成年子女,或者提供劳务帮助,子女将为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老年人家庭中子女内部的代际支持分工模式也体现了群体合作模式特征,外出增加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这使得代际之间的照料帮助和情感交流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而对外出子女而言,远距离外出也意味着经济状况的更大改善。所以,对于和父母居住较远的子女而言,他们会通过增加经济帮助来补偿其在日常照料和情感交流方面的匮乏。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的农村家庭仍遵循传统的家庭代际支持模式,但是,正如对流动人口群体的分析所展示的那样,由于迁移所带来的外出者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一传统的养老模式正在不断受到冲击。

从整体来看,成年子女的外出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外出者养老观念的变化、养老能力的改变以及与代际间空间距离增加所带来的照料资源的减少。现代城市生活对外出子女思想意识的熏陶进而对其传统的养老观念产生冲击。随着外出子女经济收入的增加、眼界的开阔,他们更加追求平等的代际关系,传统的家庭至上、父母至上的观念为追求个人价值的观念所代替。一方面,他们在观念、习惯及兴趣爱好方面与父母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增加了代际间交流的难度,甚至两代人分开居住的可能性大大上升,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资源减少;另一方面反映在年轻子女一代对“崇老文化”的认同感降低,传统观念对其履行养老责任的自我约束力下降,从而导致为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的意愿随之降低。尽管由外出所带来的子女经济状况的改善增强了外出者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的能力,使得他们在传统的代际交换和家庭养老分工模式中能够处于经济支持提供者的位置,并以此来获得其他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照料和劳务帮助。然而,在现代社会和家庭中老年人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越来越难以胜任在维系传统的群体合作模式运行时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血缘、亲情关系以及周围的社会舆论约束成为维系老年人在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核心位置的重要条件,也是传统的代际互惠和交换模式得以实现的关键。大规模的乡城之间的人口流动加速了现代城市文明和西方文化在中国传统乡村社区的传播,而成年子女陆续离开乡村社会的现象也使得原有的社会舆论约束能力大大降低。在此背景下,既有的中国传统家庭的代际支持和分工模式难以为继,以父母所在的大家庭为单位所进行的群体内的代际支持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利他性准则将逐渐被打破,老年人在代际交换中的核心地位岌岌可危。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模式冲突的角度来审视流动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的作用,那么,其对其代际支持动机和意愿的改变是最根本的,并最深远影响。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外出子女的社会网络对其代际支持行为存在深刻的影响。实际上,迁移者的社会网络是其在迁移过程中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经历的重要反映,也成为这些离家外出者在流入地再社会化和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标志。外出者社会网络的规模 and 不同特质的社会关系,诸如血缘、地缘关系以及迁移后获得的新关系,折射出迁移过程及迁移后的现代文化和城市生活对他们传统思想观念及行为的冲击和影响,而这正是本文分析迁移对外出成年子女代际支持行为影响的重要思路。但是,受调查数据中关于外出者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构成和养老观念变化的测量信息有限的制约,文中对于外出子女在流入地社会网络中的血缘、地缘关系以及迁移后获得的新关系的构成变化对于其养老观念变化的作用,及其进一步对于其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仅作出了初步的推断和分析,对于外出者在流入地因社会融入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社会网络异质性,及其所带来的代际支持行为上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 1 杜鹏. 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现状与变化. 人口研究 2003; 6: 38-44
Du Peng. 2003.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nges of Main Economic Resources of Chinese Elderly. Population Research 6: 38-44.
- 2 叶敬忠, 贺聪志.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 人口研究 2009; 4: 44-53
Ye Jingzhong and He Congzhi. 2009. Impact of Rural Out-migrant Workers on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Parents Left-behind. Population Research 4: 44-53.
- 3 Skeldon, Ronald. 1999. Ageing of Rural Populations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38-55.
- 4 杜鹏, 丁志宏等. 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 人口研究 2004; 6: 44-52
Du Peng, Ding Zhihong et al. 2004. Impact on Ageing Parents of Their Children Leaving Home for Work Outside. Population Research 6: 44-52.
- 5 张文娟, 李树茁. 中国农村老年人的代际支持: 应用对数混合模型的分析. 统计研究 2004; 5: 32-38
Zhang Wenjuan and Li Shuzhuo. 2004. A Study 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ese Familie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tudy 5: 32-38.
- 6 孙娟娟. 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 人口学刊 2006; 4: 14-18
Sun Juanjuan. 2006. Care for the Left-behind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Labor Migration. Population Journal 4: 14-18.
- 7 John Knodel, Chanpen Saengtienchai. 2007. Rural Parents with Urban Childre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for the Rural Elderly in Thailand.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Vol. 13 Issue 3: 193-210.
- 8 Cox, D. 1987.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5: 508-46.
- 9 Becker, G. S. 1993.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arge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0 Sun, R. 2002. Old Age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from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 Research on Aging 24(3): 337-359.
- 11 Silverstein, M., et al. 2002.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Rural Chinese Families: A Corporate Model of Exchange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Gerontology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 in 2002, Boston.
- 12 段成荣, 杨舸, 张斐, 卢雪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人口研究 2008; 6: 30-43
Duan Chengrong, Yang Ge, Zhang Fei and Lu Xuehe. Nine Trends 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pulation Research 6: 30-43.
- 13 S. A Lee, Everett. 1996.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1: 10-14.
- 14 段成荣. 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 人口研究 2000; 4: 14-22
Duan Chengrong. 2000. Individual Level Determinant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and the Importance of Time in Migration Studies. Population Research 4: 14-22.
- 15 程名望, 史清华, 刘晓峰.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从推到拉的嬗变.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6: 105-111
Cheng Mingwang, Shi Qinghua and Liu Xiaofeng. 2005.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Labor Immigrations in China: from Pull to Push.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105-111.
- 16 Da Vanzo, Julie. 1981. Repeat Migration, Information Cost, and Local-specific Capital.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Vol. 4(1): 45-73.
- 17 Yap. 1977. The Attraction of Cities: A Review of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4: 239-264.
- 18 Marmesh and Rees. 1993. The Economics of Work and Pay.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 19 严善平.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机制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1: 71-77
Yan Shanping. 2007.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he 1990's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1: 71-77.

- 20 吴兴陆, 齐名杰, 冯宪. 中国农民工流动机理的理论探索.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6: 41-47
Wu Xinglu, Qi Mingjie and Feng Xian. 2003.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Mechanism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6: 41-47.
- 21 Chan, Angelique. 1999.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geing in Asia. South 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7 (2) : 1-8.
- 22 Hermalin A I. 2002. Aging in Asia: Facing the Crossroads,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Asia : A Four 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24.
- 23 张友琴. 城市化与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厦门市个案的再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2; 5: 114-120
Zhang Youqin. 2002. Urbanization and the Family Support Network for Elderly. Sociological Studies 5: 114-120.
- 24 Du, P. and P. Tu. 2000. Population Ageing and Old Age Security. 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China, Blackwell Publishers.
- 25 罗忆源. 农民工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 青年研究 2003 ; 11: 1-10
Luo Yuanyi. 2003. Effects of Migration of Farmer Labor on Their Social Network. Youth Studies 11: 1-10.
- 26 杨菊华.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人口与经济 2010; 2: 64-70
Yang Juhua. 2010. Index of Assimilation for Rural - to - Urban Migrants: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ssimilation Theory.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2: 64-70.

(责任编辑: 沈 铭 收稿时间: 2011 - 03)